

裕固族中学生族群认同的容器隐喻和差序格局*

邓碧琳¹ 王婷¹ 张积家¹ 刘显翠² 刘莎²

(¹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心理学系, 桂林 541004) (²西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兰州 730070)

摘要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各民族在族群认同基础上建构的高层次共同内群体, 其内部认同存在层次性。通过 3 个实验考察处在族群边缘的裕固族中学生族群认同的容器隐喻、差序格局及影响因素。实验 1 采用空间 Stroop 范式, 发现裕固族中学生对本民族、本地其他民族、国内其他民族名称呈现在圈内反应显著快于呈现在圈外, 对国外民族名称呈现在圈内反应显著慢于呈现在圈外, 对民族名称反应从快到慢依次是本民族、本地其他民族、国内其他民族、国外民族, 说明裕固族中学生已经建构了高层次共同内群体——“中华民族共同体”, 且呈现出认同的差序格局。实验 2 采用图形分类任务, 发现裕固族中学生倾向采用同一图形标记裕固族、藏族、汉族和蒙古族, 表明在认知层面, 族际接触水平和宗教信仰是主要影响因素, 族群中心地位和族源关系起一定作用, 民族语言作用较小。实验 3 采用街道距离测验, 发现裕固族中学生倾向把与自己家更近房子分配给蒙古族和藏族, 表明在情感态度层面, 影响族群认同差序格局的主要因素与认知层面基本一致。这表明, 族际接触水平和宗教信仰是影响裕固族中学生族群认同差序格局的最主要因素。

关键词 裕固族, 族群认同, 容器隐喻, 差序格局, 中华民族共同体

分类号 B844; B849: C91

1 引言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我国各民族经过重新范畴化将族群成员身份由“我族”(内群体)和“他族”(外群体)转变成的一个包摄水平更广的高层次共同内群体。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 将内群体范围扩大, 促进个体将对本民族的积极印象转移至他族, 减少了族群间偏见, 增加了族群间的心理融合度(梁芳美等, 2023)。

1.1 中华民族共同体与族群边缘

族群是由血缘和历史传承下来的文化界定的人群。族群不全然由生殖繁衍造成, 更由集体记忆造成。一群人对外异的己感和对内的一体感形成了族群边界, 族群边界的维持与变迁确定了族群。从族群本质看, 族群是主观认同范畴, 而非是外貌、语言与文化的综合体。族群中心和族群边缘因为族群边界而存在, 族群边界是多重的、可变的、可被

利用的(王明珂, 2006)。处于族群中心的人难以与他群接触, 因为优势的社会地位, 对表达族群身份的社会文化特征比较自由、多变, 民族意识不强。处于族群边缘的人群因为劣势社会地位却经历了或融合或分裂或消亡的过程, 是社会或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经历者, 对标志族群身份的社会文化特征尤为重视, 民族意识和共同体意识尤为强烈。Anderson (2006)认为, 族群边缘的个体或群体认同的共同体并非是纯粹客观存在的实体, 而是综合了血缘关系、空间地域、历史记忆和语言文字共同构建出来的文化与政治的“想象共同体”。处在认同变迁的边缘族群既具有我群特征, 又具有他群特征, 更容易发现族群间的感知相似性, 更容易形成共同内群体, 也更容易因为不确定和不稳定的认同状态而产生身份认同危机。这种边缘、不规则、变化的族群现象在族群中心很难被发现, 所以尤其值得关注。

收稿日期: 2024-03-21

* 教育部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委托项目。

通信作者: 张积家, E-mail: Zhangjj1955@163.com

人类学、民族学对中华民族研究多从主体民族(汉族)视角出发,多从儒教、华夏等中原或中心角度分析,“华夷秩序”“朝贡体系”及“天下观念”构成“从中心看边缘”视角,不可避免地存在民族中心主义和文化中心主义的偏见(麻国庆,2006),王明珂更重视处在边缘的族群,这集中体现在《华夏边缘》一书中,构成了“从边缘看中心”视角。张积家和冯晓慧(2022)认为,“从边缘看中心”视角避免了“从中心看边缘”视角的弊端,是观察和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心理发展的最佳视角。但他们对族群边缘的界定与王明珂不同:王明珂以处在中国或“华夏”边缘的人为对象来研究中华民族发展,张积家等对族群边缘的定义是:族群边缘是指处于不同族群边界地带的个体或群体,在他们身上,族群边界不很清晰,出现了既属于这一族群又属于另一族群的情况,其族群身份(血缘身份、文化身份)与公民身份存在矛盾或不一致之处,其族群认同状况甚为复杂。他们或者正处在族群形成或者分化中,或者是血缘与文化的“混血儿”,或者正在整合成一个更大的共同体。在他们身上,既有我群的特征,又有他群的特征,其客观特征如此,其主观心理也如此。

在中华民族发展中,华夏民族视他族为“蛮夷戎狄”,族群中心通过强化“异质边缘”来增强内部凝聚力。在近代中国建构中,西方列强入侵中国,在国家与民族的生死存亡之际,将传统华夏边缘纳入国家与华夏民族内合为一建立了中华民族。张积家和冯晓慧(2022)认为,族群中心与族群边缘在不同时空条件下有不同含义。在当下中国,跨界民族、族际通婚者及子女、民族走廊上的民族、港澳台同胞及海外华人、人口众多民族的不同支系或民系、未识别民族和族别异民族、双文化者都是处在族群边缘的群体。相较于族群中心群体,他们的族群特征更突出,同时也更容易受他族文化冲击;其族群身份与族群认同在复杂变化中生成,因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性不同。故而,族群边缘为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心理发展提供了最佳视角,这种研究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重要意义。

1.2 族群认同的容器隐喻和差序格局

族群认同是个体对族群成员身份的归属意识。族群认同涵盖三个要素:族群认知(包括类别化和归因)、族群情感(包括态度和归属感)、族群交往行为(Carla & Reginald, 1998)。族群认知的最基本方式是分类,它将群体归类达到高效且自动化,帮助

简化认知过程。族群身份类别化会引发对族群的情感依附,常以对族群成员或族群的情绪体验和态度展现出来,体现为内群体偏爱与外群体偏见和歧视(Tajfel & Turner, 1986)。族群认知和族群情感一致更容易产生对应的行为倾向,为族群行为做好准备。

多民族国家的族群认同是复杂的、多维度的概念,在基层民族认同和高层共同体认同之间存在张力。如何在维护基层的民族认同同时,促进高层认同形成与巩固,是多民族国家的重要课题。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内含多层次的族群单位。56个民族在基层的民族认同基础上形成了高层的中华民族认同,个体对共同内群体内部的其他族群认同不存在矛盾,却存在与个体的亲疏远近不同(张积家,张姝玥,2024)。张积家(2018)将费孝通(2004)的差序格局理论与容器隐喻结合,从全新视角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解读为国人的“容器隐喻和差序格局”。容器隐喻(Container Metaphor)是借助于容器状意象图式来表征抽象概念,根据内-外感知表征事物类别、个体与他人之间的亲密关系(Schröder, 2015)。容器“内”与同类事物、关系亲近的人、性质好的事物存在隐喻联结;容器“外”与不同类别事物、关系疏远的人、性质不好的事物存在隐喻联结(孟乐等,2022)。在同一容器内部的各事物之间,并非距离均等,而是存在亲疏远近的不同。容器隐喻的主要测量指标是空间 Stroop 范式下的反应速度:当个体/群体与容器的配对关系符合容器隐喻时,反应就快;当个体与容器的配对关系不符合容器隐喻时,反应就慢(张积家,2018)。孟乐等(2022)发现,内地西藏班高中生对国内民族人名呈现在圈内反应显著快于呈现在圈外,对国外民族人名呈现在圈外反应显著快于呈现在圈内,说明内地西藏班高中生建构了中华民族共同内群体认知,将国内民族成员置于容器内,将国外民族成员置于容器外。冯晓慧等(2023)发现,广西龙胜县的少数民族中学生对中华民族认同存在差序格局:本民族处在“认同”中心,往外层是经常接触的本地其他民族,然后是未接触过的国内其他民族。上述研究初步证实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的族群认同存在容器隐喻和差序格局,但内地西藏班学生生活在内地,龙胜县处于南疆走廊,多民族在那里杂居,共同体意识就容易产生。由于缺乏对民族关系在历史上错综复杂且动荡地区民族的研究,因而实验结果的推广尚需要谨慎。

1.3 影响族群认同差序格局的因素

族群认同是一种社会认同。个体在与族群内、外人群互动中,受族群情境中多方面因素(族际接触水平、族源关系、语言、宗教、历史记忆、群体威胁等)影响而加入、接纳或脱离一个族群,族群边界在动态过程中变化,造成了族群认同的维持与变迁。本文将重点考察族际接触水平、族源关系、语言和宗教信仰对族群认同差序格局的影响。其中,族际接触水平是可控、可以改变的建构因素,族源关系、语言、宗教信仰是稳定、难以改变的非建构因素。

(1) 族际接触

研究表明,族际接触是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关键因素之一。族际间直接接触让个体对外群体态度发生改变,弱化原来的族际边界(万明钢等, 2015)。族际间间接接触(扩展性接触、准社会接触、替代接触、想象接触等)也改善对外群体态度(Dovidio et al., 2011)。依据群际接触的次级转移效应(Secondary Transfer Effect, STE),初级外群体通过直接或间接接触获得的积极效应再转给次级外群体,同样改善成员对外群体态度。群际接触理论(Intergroup Contact Theory)强调,群际间接触有效减少偏见的运作机制依赖于在最优先决条件下进行直接或间接接触和中介变量的作用。最优先决条件包括群际间的平等地位、共同目标、支持性的规范和群际合作。减少群际偏见的中介变量主要有:①认知因素,能否获取改变对外群体负面认知的信息;②情感因素,能否缓解原有的接触焦虑,产生共情;③行为因素,群际互动是否积极;④功能联系,群际间是否存在合作关系(夏明慧, 2019)。单独或同时满足最优先决条件和依靠中介变量的作用,均发挥群际接触的积极效果。

我国各民族“大分散、小聚居、交错居住”的空间互嵌式格局为族际接触提供了便利地理条件,族际间积极接触,提高对族际差异性的理解和尊重,有效地改善族际关系,更好地促进各民族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多个族群相互接触、碰撞、摩擦、交融的族群边缘,更容易观察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

(2) 族源关系

族源,是指民族的源头,代表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和传承来源。族源是影响族群认同的根基性因素。每一族群都有追溯族源的情感需求。这是自我认同中关于“我是谁?我从何而来?我为何而来?”的强烈寻根意识,是族群集体意识的体现(江

杰英, 2012)。一个族群在历史长河中绵延,既有来自远古时代的血缘延续,也有近古时期融入新族群等变迁,借助原有族源关系改变造就了族群边界迁移,并通过选择性记载族源历史实现族源变迁的合理性。族源历史记忆和集体生活不断影响族源相关民族间的亲疏远近,在长期潜移默化的共同生活经历影响下,形成了对族源相关民族的独特感情,强化了对族源相关民族的认同。族源相关民族间不仅血缘相关,族源历史记忆共享,语言、风俗习惯、生产方式虽不完全相同,也存在相似性。族群间的感知相似性激发个体产生积极的族际态度及发展亲密关系的动机(Singh et al., 2017)。族源相关带来的民族间相似性因为类别强化被个体主观地夸大,有利于产生积极的族际交往态度,促进族群重新范畴化或扩大边界,形成了共同内群体(Lemay & Ryan, 2021)。

由于资源环境改变,族群边缘群体经常利用“历史上的迁徙”等虚构的社会记忆来宣称我族或他族的起源,并将新族群合理化以形成主观的血缘关系(王明珂, 2006)。因而,探究族群边缘民族在历史上对外宣称的族源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归属认知和根基性情感依附,有助于了解族群的发展与演变,发现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规律。

(3) 语言

语言是族群交往交流交融的媒介,也是族群文化创造和传承的重要方式(严庆, 谭野, 2024)。语言与身份建构密切相关,是区分不同族群的重要特征(孟红莉, 郭炜淞, 2023)。个体通过语言传递信息、交流文化、表达情感,进而以独特的社会功能构建新的想象共同体(吕俊彪, 2023)。当不同族群的人使用同一种语言时,会引发群体间成员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超越了原有的族群认同,形成了更高层次的共同内群体认同(严庆, 谭野, 2024)。族群间使用不同语言,更容易被归为外群体成员,族际态度更消极。Gluszek 和 Dovidio (2010)发现,在美国,非母语口音的讲话者感受到更多偏见和更少归属感。语言是族群成员资格的重要的、基本的要素,人们自然而然地将讲同样语言的人联系在一起(孟红莉, 郭炜淞, 2023)。我国 56 个民族有 73 种语言,30 个有文字民族有 55 种文字,正在使用的有 26 种(严庆, 谭野, 2024)。不同民族间语言相同或相似,激发民族间扩展边界形成更高层次的共同体。

共同语言与无障碍沟通是民族共同体感情形成的基础。但是,“共同语言”不一定是母语(王明珂,

2006)。在族群边缘, 社会变迁使得各民族之间往来密切, 母语(民族语言)的交际作用逐渐被弱化, 国家通用语或地方话成为各族群的沟通工具。因而, 语言亦是了解影响族群边缘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途径。

(4) 宗教

宗教是一种象征符号体系, 它通过形成有关存在的普遍秩序概念, 在人群中间建立了强有力、普遍和持续长久的情绪及动机(朱晓阳, 2023)。宗教是一种信仰, 它经由特殊的宗教仪式、经文、建筑等影响信徒, 形成了源自宗教信仰、实践、经验、情感或关系的应对模式。在信徒的价值观、目标和努力面临挑衅、威胁甚至丧失时, 宗教作为资源保存或转化它们(Abu-Raiya & Pargament, 2015)。赖俊(2017)用“沉默的螺旋”(Downward Spiral of Silence)理论揭示宗教对信徒的影响, 认为宗教舆论和意识形态使得相冲突的声音被边缘化直至沉默, 最终达到信徒对信仰的信从并形成了对其他信徒的群体认同。宗教信徒组成的群体是超血缘、超地域、超种族、超经济、超阶级的, 它以群体成员共同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情感作为基础(段德智, 2005)。在共同的宗教信仰、宗教情感和宗教体验影响下, 信徒会不自觉地将宗教信仰相同的群体与自己归为一类, 将宗教信仰不同的群体归为他类。宗教情感与民族情感交织渗透, 宗教信仰就成为民族自我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王颖, 秦裕华, 2008)。

宗教对族群边界确定有重要意义(菅志翔, 2004)。王瑞萍和马进(2012)考察宗教对撒拉族和保安族青年择偶心态的影响, 发现个体对宗教信仰的重视远高于对民族的重视, 75.86%的受访者选择“同一宗教信仰”的人为婚恋对象, 仅有 19.82%的受访者选择“同一民族”的人为婚恋对象。萨缪尔·亨廷顿(2010)写道:

血统、语言、宗教、生活方式是希腊人共有的东西, 也是他们区别于波斯和非希腊人的东西。然而, 正如雅典人所强调的, 在所有界定文明的客观因素中, 最重要的通常是宗教。人类历史上的主要文明在很大程度上被基本等同于世界上的伟大宗教; 那些具有共同的种族和语言, 但在宗教上相异的人们可能相互屠杀, ……。

纵观国际和国内的热点问题, 都与宗教、民族分不开(张志刚, 2008)。宗教是影响种族间、民族间交流交往交融的重要因素(徐志坚, 2023)。我国是一个多宗教国家, 其中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虽源

自外部传入, 但历经了悠久岁月已深植本土。族群边缘的个体和群体经历了多次认同变迁, 形成了有特色的宗教信仰来强调内部一体性以设定边界来排除他人。探讨族群边缘群体的宗教信仰对认同的影响, 对推进宗教中国化有重要意义(张祎娜, 2023)。

张积家和冯晓慧(2021)指出, 从民族认同发展到中华民族认同不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 需要各民族成员在共同心理基础上不断铸造。从族群边缘来探讨影响族群认同的因素, 有助于进一步把握各层级认同的共同性与差异性, 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理论依据。

1.4 处于族群边缘的裕固族

裕固族聚居于祁连山北麓肃南裕固族自治县, 是河西走廊(费孝通, 1982)上处于族群边缘的少数民族之一。民族走廊有“中心与边缘”的空间圈层结构(李星星, 2013), 展现出族群分化、整合及重组的多种族群互动模式, 它既是边缘又是多元文化的中心, 能够全面、宏观、整体地看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内在成分的运动过程(张积家, 冯晓慧, 2022)。裕固族是河西走廊上众多人数较少民族之一(周大鸣, 2018), 在全国, 裕固族人口约 14706 人(中国统计年鉴 2021, 2024), 主要集中于肃南县(10684 人)(肃南年鉴 2021, 2024)。肃南县人口少却有 16 个民族, 裕固族夹在汉族、藏族、蒙古族和回族四个大民族之间, 既与大民族间紧密联系又在语言、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上保持独特性。作为民族走廊上的小民族, 裕固族在多元互动中仍坚守本族文化和认同, 并处理好与周边大民族的关系, 这种现象在族群中心并不多见。

民族走廊上的人数较少民族是民族走廊地带人群互动融合的结果(周大鸣, 2018)。裕固族源自于古代回纥(回鹘), 与维吾尔族同源, 经历了历史迁徙, 一支定居于河西走廊, 成为裕固族先民。在历史上, 裕固族曾一度受蒙古族统治(杨富学, 张海娟, 2015), 与蒙古族杂居混牧, 形成了操双母语的裕固族, 自称“尧熬尔”(Yugur)(安玉军, 2017)。裕固族的语言分为东部裕固语和西部裕固语, 分别受蒙古语和古回鹘语影响。裕固族无本民族文字, 通用交际语言为汉语。在族源上, 裕固族与蒙古族、维吾尔族相关, 但受藏文化、汉文化影响深远。王明珂(2006)认为, 重要的不是生物的共同祖源, 而是宣称的共同起源, 被选择、强化的历史记忆是造成个体认同体系建构的主要原因。

在历史上的族群边界变迁中, 有什么因素强化了裕固族的凝聚? 在个体与族群内外的互动中, 有

哪些记忆被选择、强化, 有哪些记忆被修正、遗忘, 从而造成族群认同的维持与变迁? 处在族群边缘的裕固族, 为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提供了一个绝佳对象。本研究依托裕固族的边缘特性和在空间上多民族互嵌式聚居、混居的格局, 考察裕固族中学生的族群认同, 实验 1 探究裕固族中学生的族群认同是否存在容器隐喻和差序格局, 如果存在, 进一步通过实验 2 和实验 3 分别从认知层面和情感层面理清族际接触、族源关系、语言和宗教对族群认同的影响及相互作用, 以便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提供理论根据。

2 实验 1: 裕固族中学生族群认同的容器隐喻与差序格局

容器的最主要隐喻是类别(Schröder, 2015), 可通过空间 Stroop 范式测量。这种方法通过对容器内、外事物反应来探究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心理结构。实验 1 采用空间 Stroop 范式考察裕固族中学生的族群认同是否存在容器隐喻和差序格局。研究假设为: 裕固族中学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与容器位置形成内隐性隐喻联结, 国内民族被知觉为处在容器内, 属于共同内群体成员; 国外民族被知觉处在容器外, 属于共同外群体成员; 对处在容器内的国内民族, 裕固族中学生还会根据亲疏远近呈现出认同层次性, 即呈现出差序格局。

2.1 被试

采用 G*power 3.1.9.7 软件预估样本量, 设定中等效应量 effect size = 0.25, α error = 0.05, 统计检验力(power)为 0.95, 计算需要 23 名被试。为保证实验效果, 从肃南县第一中学、肃南县职教中心招募 117 名被试: 男 57 人, 女 60 人; 东部裕固语区 55 人, 西部裕固语区 62 人。被试来自肃南县各乡镇, 人数与裕固族在各乡镇的分布匹配。父亲为公职人员 17 人, 公司职员 6 人, 专业技术人员 4 人, 农民/牧民 73 人, 个体户 7 人, 其他 10 人; 母亲为公职人员 13 人, 公司职员 7 人, 专业技术人员 7 人, 农民/牧民 66 人, 个体户 12 人, 其他 12 人。裕固族以牧民居多, 父母的学历水平相对低。父母族际通婚比例为 46.16%。平均年龄为 15.32 ± 1.64 岁; 视力和矫正视力正常, 熟练运用汉语阅读和写作。

2.2 设计

4 (民族类型: 本民族/本地其他民族/国内其他

民族/国外民族) \times 2 (呈现位置: 圈内/圈外) 被试内设计。因变量为容器隐喻, 客观指标为对民族名称在圈内外呈现时的反应时和错误率。

2.3 材料

选取 4 个本地其他民族、4 个国内其他民族和 4 个国外民族。本地其他民族取自肃南的常见民族: 藏族, 蒙古族, 回族, 汉族。为确保各水平下材料的一致性, 国内其他民族选取被试未直接接触过的白族、布朗族、德昂族、彝族, 国外民族选取丹麦族、法兰西族、缅甸族、英吉利族。另选取 14 个虚假民族作为填充材料, 如桌子族、头族等。One-Way ANOVA 分析表明, 4 类民族名称字数差异不显著, $F(3, 9) = 1.51, p > 0.05$; 笔画数差异不显著, $F(3, 9) = 0.57, p > 0.05$ 。考虑到被试未直接接触过国内其他民族和国外民族, 先学习相关民族的资料, 确保熟悉后再实验, 4 类民族名称的熟悉性(7 点评分)差异不显著, $F(3, 9) = 1.23, p > 0.05$ 。

2.4 程序

参照孟乐等(2022)的研究, 采用 E-prime 2.0 编程。实验程序为: 首先, 在屏幕中央呈现注视点“+”500 ms, 接着在屏幕中央同时呈现民族名称和圆圈(民族名称呈现在电脑屏幕的中央位置, 圆圈随机地将民族名称包含在圈内或置于圈外, 平衡圆圈出现的上下左右方位, 见图 1), 要求被试忽略圆圈又快又准地判断目标词是否是真实民族。被试间平衡左右手按键方式。被试按键后, 呈现 500 ms 空屏, 随后进入下一试次。实验前采用非实验材料做 10 次练习, 如不熟练, 可按键返回再次练习直至熟悉程序。实验包括 216 试次, 流程见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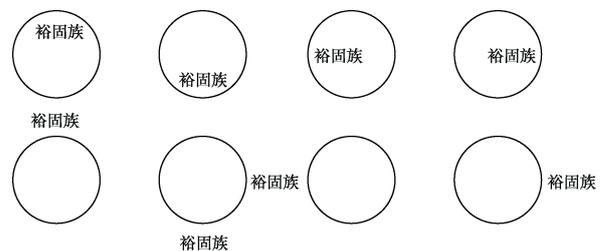


图 1 民族名称与圆圈的位置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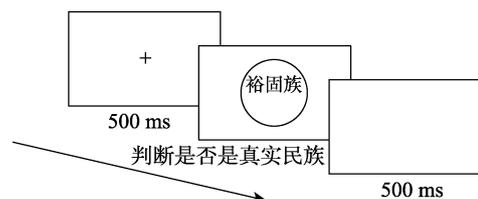


图 2 实验 1 流程图

表1 不同位置民族名称判断的平均反应时(ms)和平均错误率(%)

呈现位置	本民族名称		当地其他民族名称		国内其他民族名称		国外民族名称	
	反应时	错误率	反应时	错误率	反应时	错误率	反应时	错误率
圈内	677(115)	1.62(5.33)	730(87)	1.80(3.80)	787(100)	4.09(6.49)	860(96)	6.51(8.01)
圈外	737(98)	1.63(5.36)	769(88)	1.97(4.31)	825(91)	3.43(5.97)	807(100)	6.29(8.27)

注: 括号内的数字为标准差。

2.5 结果与分析

被试的反应正确率均在85%以上。反应时分析时剔除错误反应和反应时在 $M \pm 2.5 SD$ 之外的数据。只分析对真实民族的反应。结果见表1和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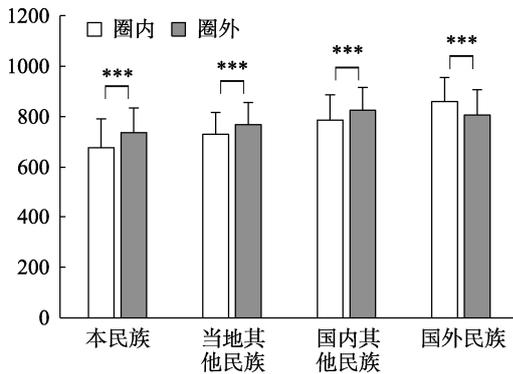


图3 不同民族名称判断的平均反应时(ms)

反应时的方差分析表明, 民族类型的主效应非常显著, $F(3, 348) = 101.50, p < 0.001, \eta_p^2 = 0.47$ 。呈现位置的主效应非常显著, $F(1, 116) = 14.78, p < 0.001, \eta_p^2 = 0.11$ 。民族类型与呈现位置的交互作用非常显著, $F(3, 348) = 27.15, p < 0.001, \eta_p^2 = 0.19$ 。简单效应分析表明, 本民族名称呈现在圈内反应显著快于呈现在圈外, $p < 0.001, 95\% CI = [-80, -38]$; 当地其他民族名称呈现在圈内反应显著快于呈现在圈外, $p < 0.001, 95\% CI = [-57, -20]$; 国内其他民族名称呈现在圈内反应显著快于呈现在圈外, $p < 0.001, 95\% CI = [-56, -19]$; 国外民族名称呈现在圈内反应显著慢于呈现在圈外, $p < 0.001, 95\% CI = [32, 74]$ 。当民族名称呈现在圆圈内时, 本民族名称反应显著快于当地其他民族名称($p < 0.001, 95\% CI = [-75, -31]$)、国内其他民族名称($p < 0.001, 95\% CI = [-134, -86]$)、国外民族名称($p < 0.001, 95\% CI = [-207, -160]$), 当地其他民族名称反应显著快于国内其他民族名称($p < 0.001, 95\% CI = [-77, -37]$)、国外民族名称($p < 0.001, 95\% CI = [-148, -112]$), 国内其他民族名称反应显著快于国外民族名称($p < 0.001, 95\% CI = [-91, -55]$); 当民族名称呈现在圈外时, 本民族名称反应显著快于当地其他

民族名称($p = 0.001, 95\% CI = [-52, -13]$)、国内其他民族名称($p < 0.001, 95\% CI = [-112, -65]$)、国外民族名称($p < 0.001, 95\% CI = [-94, -48]$), 当地其他民族名称反应显著快于国内其他民族名称($p < 0.001, 95\% CI = [-75, -37]$)、国外民族名称($p < 0.001, 95\% CI = [-58, -19]$), 国内其他民族名称与国外民族名称的反应时差异不显著($p > 0.05, 95\% CI = [-0.16, 35]$)。

错误率的方差分析表明, 只有民族类型的主效应显著, $F(3, 348) = 26.36, p < 0.001, \eta_p^2 = 0.19$ 。均数比较表明, 本民族名称与本地其他民族名称的错误率差异不显著($p > 0.05, 95\% CI = [-0.01, 0.01]$)、本民族名称错误率显著低于国内其他民族名称($p < 0.001, 95\% CI = [-0.03, -0.01]$), 显著低于国外民族名称($p < 0.001, 95\% CI = [-0.06, -0.03]$), 本地其他民族名称错误率显著低于国内其他民族名称($p < 0.001, 95\% CI = [-0.03, -0.01]$)、国外民族名称($p < 0.001, 95\% CI = [-0.06, -0.03]$), 国内其他民族名称错误率显著低于国外民族名称($p < 0.001, 95\% CI = [-0.04, -0.01]$)。其他的主效应和交互作用均不显著, $ps > 0.05$ 。

2.6 小结

实验1发现, 在反应时上, 民族名称类型与呈现位置之间交互作用显著, 国内民族名称呈现在圈内反应显著快于呈现在圈外, 国外民族名称呈现在圈内反应显著慢于呈现在圈外。这表明, 裕固族中学生在民族类别建构时, 将国内民族和国外民族知觉为在容器的不同位置, 国内民族被知觉为在容器内, 国外民族被知觉为在容器外; 国内各民族与容器内存在内隐隐喻联结, 被重新范畴化成为一个高层次共同内群体——“中华民族共同体”, 国外民族与容器外存在内隐隐喻联结, 被建构成一个共同外群体——“外国人”。当民族名称呈现在圈内时, 反应从快到慢依次是本民族、当地其他民族、国内其他民族, 映射出裕固族中学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差序格局: 第一层次为本民族, 个体与之直接联系; 第二层次为当地其他民族, 个体在当地空间内与之直接接触; 第三层次为国内其他民族, 个体

在国家空间内与之间接触。在错误率上,本民族名称和当地其他民族名称的错误率差异不显著,但都低于国内其他民族名称和国外民族名称,国内其他民族名称的错误率低于国外民族名称。这可能是由于当地民族与裕固族在空间上互嵌,使得裕固族中学生与当地其他民族直接接触更多,错误率也就无显著差异。

综上所述,裕固族中学生在民族类别建构中,建构了一个包含国内各民族在内的更高层次的共同内群体——“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共同内群体内部,反应呈现出由内及外分别是“本民族/当地其他民族/国内其他民族”的差序格局。

3 实验 2: 影响裕固族中学生族群认知差序格局的因素

实验 1 表明,裕固族中学生对国内民族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这种认同具有差序性。裕固族中学生族群认同的差序格局受什么因素影响?考虑到裕固族的所处环境,结合裕固族的发展史,选取了 5 个民族——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回族和汉族,从族际接触水平、族源关系、宗教信仰、语言四个角度出发,采用图形分类任务考察影响裕固族中学生的族群认同差序格局的因素,聚焦于族群认知(类别化)。

根据族际接触理论,结合裕固族的族际接触实际,将族际接触水平定义为不同民族间接触频率和互动质量的结合,操作定义包括两个因素:(1)接触频率;(2)互动质量,包括互动的深度和愉悦度。裕固族与蒙古族、藏族接触频率高,有共同的文化活动,互动质量高;裕固族与回族¹接触频率低,宗教信仰不同,饮食文化有差异,互动质量低;维吾尔族主要生活在新疆,与裕固族居住地(肃南县)距离遥远,与裕固族接触频率低,宗教信仰不同,但族源相关,互动质量可视为中等;裕固族与汉族接触频率高,使用相同的外部交际语言,但文化不同,互动质量可视为中等。族际接触频率和互动质量均高,可视为族际接触水平高;族际接触频率和互动质量均低,可视为族际接触水平低;其他情况为族际接触水平中等。与裕固族族源相关民族为蒙古

族、维吾尔族,与裕固族族源无关民族为藏族、回族、汉族;与裕固族宗教信仰相同民族为蒙古族、藏族,与裕固族宗教信仰不同民族为维吾尔族、回族,汉族没有统一的宗教信仰。语言因素比较复杂,西部裕固语与维吾尔语更相似,东部裕固语与蒙古语更相似。各民族与裕固族的族际关系见表 2。

表 2 各民族与裕固族的关系

民族	族际接触水平	族源	宗教信仰	语言
蒙古族	高	相关	相同	母语部分相似,共同使用汉语、汉字
维吾尔族	中	相关	不同	母语部分相似,共同使用汉语、汉字
藏族	高	不相关	相同	母语不同,共同使用汉语、汉字
回族	低	不相关	不同	共同使用汉语、汉字
汉族	中	不相关	无	共同使用汉语、汉字

3.1 被试

采用 G*power 3.1.9.7 软件预估样本量,设定中等效应量 effect size = 0.25, α error = 0.05, 统计检验力(power)为 0.95, 计算需要 31 名被试。从肃南县第一中学、肃南县职教中心招募被试 146 名:男生 68 人,女生 78 人;东部裕固语区被试 70 人,西部裕固语区被试 76 人。被试来自肃南县各乡镇,人数与裕固族各乡镇分布匹配。父亲为公职人员 21 人,公司职员 9 人,专业技术人员 4 人,农民/牧民 88 人,个体户 10 人,其他 14 人;母亲为公职人员 14 人,公司职员 11 人,专业技术人员 8 人,农民/牧民 85 人,个体户 13 人,其他 15 人。父母族际通婚的比例为 13.69%, 学历水平相对低。被试的平均年龄为 15.04 ± 1.76 岁,视力正常或矫正视力正常,熟练运用汉语阅读和写作。

3.2 设计

单因素(民族:蒙古族、藏族、汉族、维吾尔族、回族)被试内设计。自变量为 5 个民族,因变量为与本民族归为同类的程度,客观指标为各民族在图形分类任务中的赋分。

3.3 材料和任务

实验材料:选取与裕固族密切相关的 5 个民族——蒙古族、藏族、汉族、维吾尔族、回族,加上本民族(裕固族),共 6 个民族。

图形分类任务系自创的实验任务,要求被试使用几何图形给民族做标记,通过标记图形的相同和不同,测试内隐的民族分类。要求被试对 6 个民族

¹实验前走访了解到,回族是当地的常见民族,但因宗教信仰和饮食文化差异影响,与裕固族交往、交流不紧密,属于低质量的族际交往行为。

使用 4 种图形(圆形、三角形、正方形、长方形)标记, 标记在民族名称下方, 每一民族只使用一种图形, 每种图形至少用一次。计分规则: 给某一民族标记的图形与裕固族相同计 1 分, 标记不同的图形计 0 分。对某一民族赋分越高, 表示被试越倾向于将该民族与裕固族划分为同一类别。材料和要求见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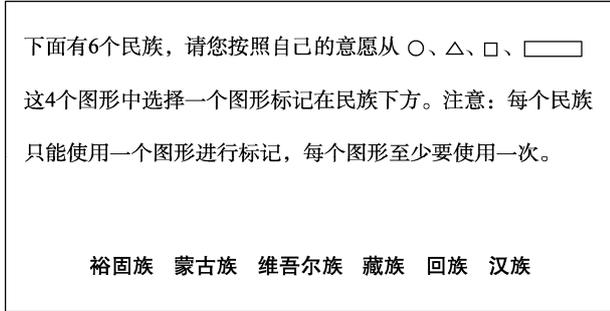


图 4 图形分类任务示意图

分类是族群认知的最基本方式, 高效且自动的类别化使同类群体被赋予相同类别标签(Brewer, 2016)。任务约束条件限制了分类结果: 一定会出现两个或三个民族使用相同的图形标记。根据类别化自动高效的特征, 被试会基于日常民族关系的理性认知快速对族群归类(Allport, 1954)。由于被试不知道图形分类意图, 这个过程不仅自动化, 而且内隐化。通过对民族标记图形的异同, 就可判断他们对民族分类的内隐认知。

3.4 结果与分析

3.4.1 影响裕固族中学生族群认知的因素

实验结果见图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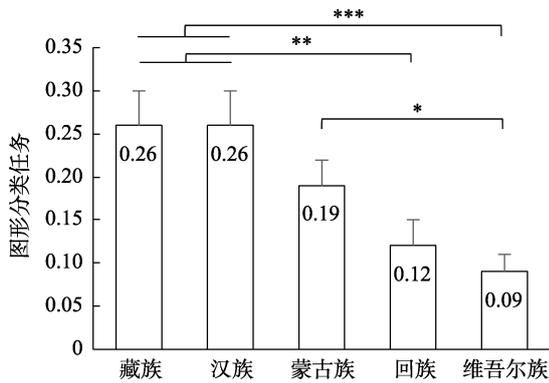


图 5 不同民族图形分类的平均分

方差分析表明, 被试对不同民族赋分差异显著, $F(4, 580) = 5.60, p < 0.001, \eta_p^2 = 0.04$ 。平均分从高到低依次是: 藏族和汉族、蒙古族、回族、维吾尔族。均数比较显示, 对汉族与藏族赋分差异不显著($p >$

$0.05, 95\% CI = [-0.11, 0.11]$); 对藏族/汉族与蒙古族赋分差异不显著($ps > 0.05, 95\% CI_{藏族} = [-0.03, 0.16], 95\% CI_{汉族} = [-0.04, 0.18]$), 但均显著高于对回族赋分($p_{藏族} = 0.004, 95\% CI_{藏族} = [0.05, 0.24]; p_{汉族} = 0.003, 95\% CI_{汉族} = [0.05, 0.24]$), 显著高于对维吾尔族赋分($ps < 0.001, 95\% CI_{藏族} = [0.08, 0.26], 95\% CI_{汉族} = [0.08, 0.26]$); 对蒙古族与回族赋分差异不显著($p > 0.05, 95\% CI = [-0.02, 0.17]$), 对蒙古族赋分显著高于对维吾尔族($p = 0.013, 95\% CI = [0.02, 0.18]$); 对回族与维吾尔族赋分差异不显著($p > 0.05, 95\% CI = [-0.05, 0.10]$)。

这表明, 在族群认知层面, 被试倾向于将藏族、汉族、蒙古族与本民族归为一类。藏族与裕固族族际接触水平高、宗教信仰相同, 汉族与裕固族接触水平中等、汉族无宗教信仰但为主体民族, 是中华民族的核心, 蒙古族与裕固族接触水平高、族源相关、宗教信仰相同。综合看来, 族际接触水平、宗教信仰和族群中心性对裕固族中学生族群认知的差序格局影响大, 族源关系和共同语言的作用相对小。

3.4.2 不同语言区裕固族中学生对族源相关民族的认知

考察东部裕固语被试和西部裕固语被试对蒙古族和维吾尔族两个族源相关民族的认知, 揭示语言对族群认同的影响。结果见图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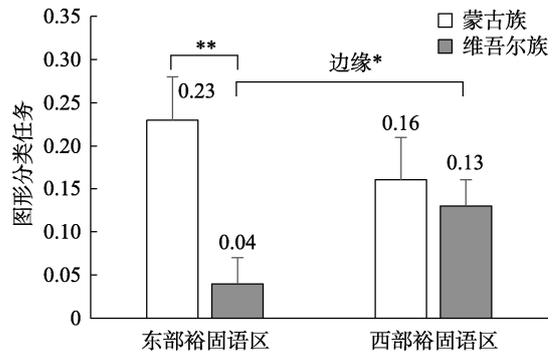


图 6 不同语言区被试对族源相关民族图形分类的平均分

2 (语言区: 西部语言区/东部语言区) \times 2 (族源相关民族: 维吾尔族/蒙古族)混合设计方差分析表明, 语言区的主效应不显著, $F(1, 144) = 0.05, p > 0.05$; 族源相关民族的主效应显著, $F(1, 144) = 6.83, p = 0.010, \eta_p^2 = 0.05$; 语言区与族源相关民族的交互作用边缘显著, $F(1, 144) = 3.86, p = 0.051, \eta_p^2 = 0.03$ 。简单效应分析表明, 东部语言区被试对蒙古族赋分显著高于对维吾尔族, $p = 0.002, 95\% CI =$

[0.07, 0.30]; 西部语言区被试对蒙古族与维吾尔族赋分差异不显著, $p > 0.05$, 95% CI = [-0.09, 0.14]。对蒙古族, 东部语言区被试和西部语言区被试的赋分差异不显著, $p > 0.05$, 95% CI = [-0.06, 0.20]; 对维吾尔族, 东部语言区被试赋分边缘显著低于西部语言区被试, $p = 0.061$, 95% CI = [-0.18, 0.00]。

这表明, 在族群认知层面, 东部语言区被试更倾向于将蒙古族与本民族归为一类, 西部语言区被试对蒙古族和维吾尔族的认同无显著差异, 但认同程度均不高。从族源关系看, 东部语言区被试对族源关系认知更清晰, 更认同蒙古族; 西部语言区被试对族源关系认知相对模糊, 对蒙古族和维吾尔族的认同程度相去无几, 虽然维吾尔族是他们的族源相关兄弟。

3.4.3 裕固族中学生对不同族际接触水平民族的认知

根据裕固族与各民族关系将族际接触划分为高、中、低三个水平, 高族际接触水平民族赋分为对蒙古族和藏族的赋分均值, 中等族际接触水平民族赋分为对汉族和维吾尔族的赋分均值, 低族际接触水平民族赋分为对回族的赋分。结果见图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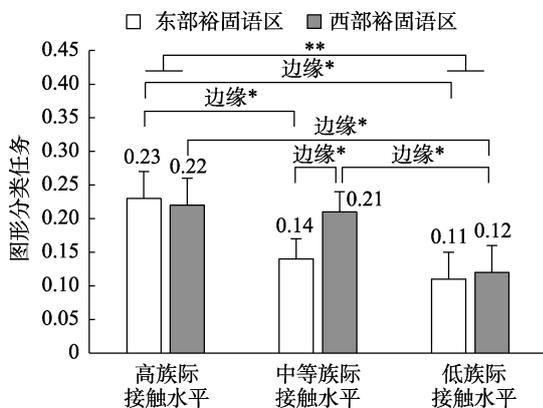


图 7 不同族际接触水平民族图形分类的平均分

2 (语言区: 东部语言区/西部语言区) \times 3 (族际接触水平: 高族际接触水平/中等族际接触水平/低族际接触水平)混合设计方差分析表明, 语言区的主效应不显著, $F(1, 144) = 1.60$, $p > 0.05$; 族际接触水平的主效应显著, $F(2, 288) = 4.13$, $p = 0.017$, $\eta_p^2 = 0.03$; 语言区与族际接触水平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F(2, 288) = 0.65$, $p > 0.05$ 。均数比较表明, 高族际接触水平民族和中等族际接触水平民族赋分差异不显著($p > 0.05$, 95% CI = [-0.02, 0.13])、显著高于低族际接触水平民族($p = 0.009$, 95% CI = [0.03, 0.19]); 中等族际接触水平民族和低族际接触水平

民族赋分差异不显著($p > 0.05$, 95% CI = [-0.01, 0.13])。均值比较显示, 东部语言区被试对高族际接触水平民族赋分边缘显著高于对中等族际接触水平民族($p = 0.084$, 95% CI = [-0.01, 0.20])、边缘显著高于对低族际接触水平民族($p = 0.059$, 95% CI = [-0.00, 0.23]), 对中等族际接触水平民族和低族际接触水平民族赋分无显著差异($p > 0.05$, 95% CI = [-0.08, 0.12]); 西部语言区被试对高族际接触水平民族和中等族际接触水平民族赋分无显著差异($p > 0.05$, 95% CI = [-0.09, 0.11]), 对二者赋分均边缘显著高于对低族际接触水平民族($p = 0.069$, 95% CI = [-0.01, 0.22]; $p = 0.066$, 95% CI = [-0.01, 0.19])。对高族际接触水平民族, 东部语言区被试和西部语言区被试的赋分无显著差异($p > 0.05$, 95% CI = [-0.10, 0.11]); 对中等族际接触水平民族, 东部语言区被试赋分边缘显著低于西部语言区被试($p = 0.059$, 95% CI = [-0.15, 0.00]); 对低族际接触水平民族, 东部语言区被试和西部语言区被试赋分无显著差异($p > 0.05$, 95% CI = [-0.11, 0.10])。

以上结果表明, 在族群认知层面, 裕固族中学生更倾向于将高族际接触水平民族与本民族归为一类, 西部语言区被试对中等族际接触水平民族(汉族和维吾尔族)分类受民族语言和族源关系影响, 因为西部裕固语保留了较多古回鹘语成分, 与维吾尔语相似。因此, 族际接触水平是影响裕固族被试族群认知的重要因素, 族群中心性和族源关系有一定影响。

3.4.4 裕固族中学生对不同宗教信仰民族的认知

将各民族与裕固族的宗教信仰异同分为“宗教信仰相同、宗教信仰不同、无宗教信仰”三个水平, 对宗教信仰相同民族的赋分为对蒙古族、藏族的赋分均值, 对无宗教信仰民族赋分为对汉族赋分, 对宗教信仰不同民族赋分为对维吾尔族、回族的赋分均值。结果见图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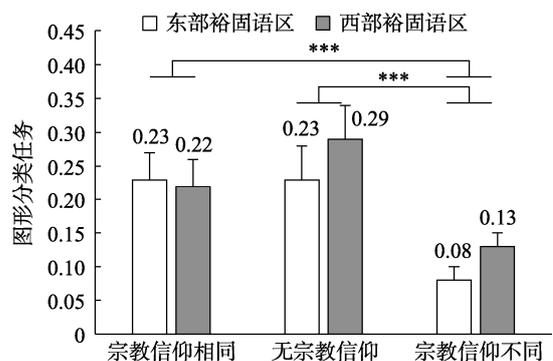


图 8 不同宗教信仰民族的图形分类平均分

2 (语言区: 东部语言区/西部语言区) × 3 (宗教信仰关系: 相同/不同/无)混合设计方差分析表明, 语言区的主效应不显著, $F(1, 144) = 2.16, p > 0.05$; 宗教信仰关系的主效应显著, $F(2, 288) = 7.42, p < 0.001, \eta_p^2 = 0.05$; 均数比较表明, 对与裕固族宗教信仰相同民族与无宗教信仰民族赋分无显著差异 ($p > 0.05, 95\% CI = [-0.13, 0.07]$), 显著高于对与裕固族宗教信仰不同民族赋分 ($p < 0.001, 95\% CI = [0.06, 0.19]$); 对无宗教信仰民族赋分显著高于对与裕固族宗教信仰不同民族赋分 ($p < 0.001, 95\% CI = [0.07, 0.24]$)。语言区与宗教信仰关系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F(2, 288) = 0.32, p > 0.05$ 。

上述结果表明, 在族群认知层面, 裕固族中学生更倾向于将宗教信仰相同民族和无宗教信仰民族(汉族)与本民族归为一类, 把宗教信仰不同民族归为他类。因此, 宗教信仰是影响裕固族中学生族群认知的重要因素。

3.5 小结

图形分类结果表明, 在认知层面, 裕固族中学生更倾向于将藏族、汉族和蒙古族与本族归为一类。对族源相关民族——维吾尔族和蒙古族, 东部语言区被试倾向将蒙古族与本民族归为一类, 西部语言区被试对蒙古族和维吾尔族认同程度均不高; 被试倾向于将高族际接触水平民族、宗教信仰相同或无宗教信仰民族与裕固族归为一类。这表明, 在认知层面, 族群中心性和族源关系起一定作用, 但更大的影响因素是族际接触水平和宗教信仰异同, 民族语言的作用较小。

4 实验 3: 裕固族中学生对不同民族的族群情感态度研究

以 5 个与裕固族熟悉的民族(蒙古族、维吾尔族、藏族、回族、汉族)来探讨族际接触水平、族源关系、宗教信仰、语言对族群情感态度的影响, 以裕固族与不同民族的心理距离为指标。如果被试与相关民族心理距离近, 就意味着其族群情感态度积极; 如果与相关民族心理距离远, 就意味着其族群情感态度消极。研究假设是: 裕固族被试对与裕固族族际接触水平高、有族源关系、宗教信仰相同、语言相同的民族心理距离更近。

4.1 被试

采用 G*power 3.1.9.7 软件预估样本量, 设定中等效应量 effect size = 0.25, α error = 0.05, 统计检

验力(power)为 0.95, 计算需要 31 名被试。从肃南县第一中学、肃南县职教中心招募 188 名被试: 男 93 人, 女 95 人; 东部语言区 95 人, 西部语言区 93 人。被试来自肃南县各乡镇, 人数与裕固族各乡镇分布匹配。父亲为公职人员 25 人, 公司职员 12 人, 专业技术人员 4 人, 农民/牧民 118 人, 个体户 10 人, 其他 19 人; 母亲为公职人员 16 人, 公司职员 16 人, 专业技术人员 12 人, 农民/牧民 113 人, 个体户 12 人, 其他 19 人。父母族际通婚比例为 14.36%, 学历水平相对低。被试的平均年龄为 14.79 ± 1.78 岁, 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 熟练运用汉语阅读和写作。

4.2 设计

单因素(民族: 蒙古族、藏族、汉族、维吾尔族、回族)被试内设计。自变量为 5 个民族, 因变量为被试与相关民族的心理距离, 客观指标为街道距离测验的赋分。

4.3 实验材料和任务

实验材料: 选取与裕固族密切相关的 5 个民族(蒙古族、藏族、汉族、维吾尔族、回族)。

街道距离测验: 要求被试为不同民族分配房子, 通过给不同民族分配的房子与自己家的距离远近, 测试对不同民族的心理距离。计分规则: 以“我的家”为基点, 由近及远的民族分别计 5、4、3、2、1 分。对民族赋分越高, 表示与该民族的心理距离越近, 情感态度越积极。实验材料和要求见图 9。

4.4 结果与分析

4.4.1 裕固族中学生与不同民族的心理距离

不同民族在街道距离测验中的平均分见图 10。方差分析表明, 被试对不同民族赋分差异显著, $F(4, 748) = 91.49, p < 0.001, \eta_p^2 = 0.33$ 。平均赋分从高到低依次是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汉族、回族。均数比较显示, 蒙古族与藏族赋分差异不显著 ($p > 0.05, 95\% CI = [-0.04, 0.48]$), 蒙古族与藏族赋分显著高于维吾尔族 ($ps < 0.001, 95\% CI_{蒙古族} = [0.76, 1.16], 95\% CI_{藏族} = [0.49, 0.99]$), 显著高于汉族 ($ps < 0.001, 95\% CI_{蒙古族} = [0.67, 1.37], 95\% CI_{藏族} = [0.51, 1.08]$), 显著高于回族 ($ps < 0.001, 95\% CI_{蒙古族} = [2.11, 2.52], 95\% CI_{藏族} = [1.89, 2.29]$); 维吾尔族与汉族赋分差异不显著 ($p > 0.05, 95\% CI = [-0.28, 0.40]$), 显著高于回族赋分 ($p < 0.001, 95\% CI = [1.15, 1.55]$); 汉族赋分显著高于回族 ($p < 0.001, 95\% CI = [1.00, 1.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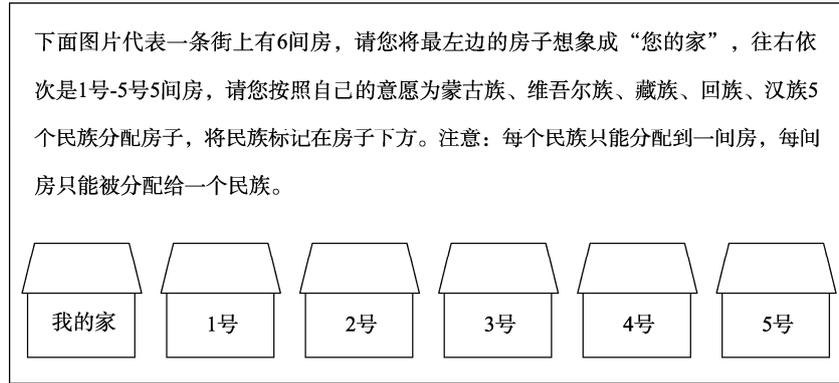


图 9 街道距离测验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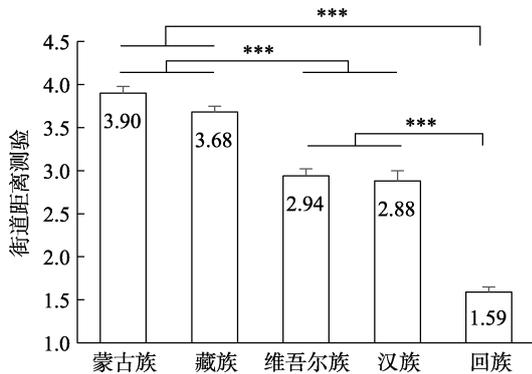


图 10 不同民族街道距离测验的平均分

这表明，在族群认同的情感态度层面，裕固族与蒙古族和藏族心理距离最近，与汉族和维吾尔族心理距离次之，与回族心理距离最远。追溯裕固族与藏族、蒙古族的关系，裕固族与藏族族际接触水平高、宗教信仰相同；裕固族与蒙古族族际接触水平高、族源相关、宗教信仰相同。可见，族际接触水平和宗教信仰对裕固族中学生族群认同的情感态度影响最大，族源关系有一定影响。

4.4.2 不同语言区裕固族中学生与族源相关民族的心理距离

不同语言区裕固族被试与蒙古族和维吾尔族两个族源相关民族的心理距离见图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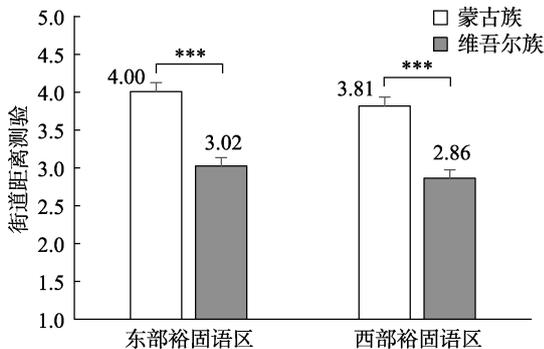


图 11 不同语言区被试对族源相关民族街道距离测试平均分

2 (语言区：西部语言区/东部语言区) × 2 (族源相关民族：维吾尔族/蒙古族)混合设计方差分析表明，语言区的主效应不显著， $F(1, 186) = 2.02, p > 0.05$ ；族源相关民族的主效应显著， $F(1, 186) = 88.84, p < 0.001, \eta_p^2 = 0.32$ ；语言区与族源相关民族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F(1, 186) = 0.03, p > 0.05$ 。均数比较表明，无论是东部语言区被试还是西部语言区被试，蒙古族赋分($M = 3.90$)均显著高于维吾尔族($M = 2.94$)， $p < 0.001, 95\% CI = [0.76, 1.16]$ 。

这表明，在情感态度层面，两个语言区的裕固族被试与蒙古族的心理距离都比与维吾尔族更近。蒙古族和维吾尔族都是裕固族的族源相关民族，但蒙古族因为与裕固族接触水平更高、宗教信仰相同，因而裕固族与蒙古族心理距离更近。

4.4.3 裕固族中学生与不同族际接触水平的心理距离

不同语言区被试与不同族际接触水平民族的心理距离见图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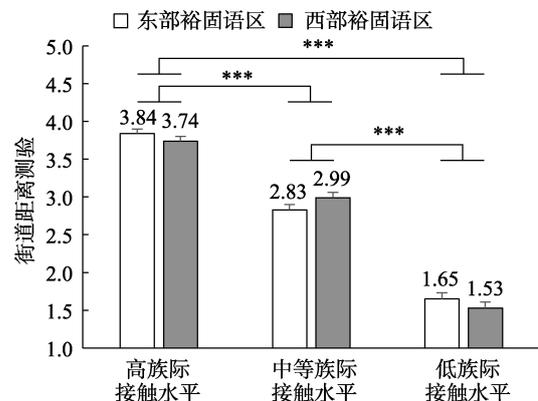


图 12 不同族际接触水平民族街道距离测验的平均分

2 (语言区：东部语言区/西部语言区) × 3 (族际接触水平：高族际接触水平/中等族际接触水平/低族际接触水平)混合设计方差分析表明，语言区的

主效应不显著, $F(1, 186) = 1.13, p > 0.05$; 族际接触水平的主效应非常显著, $F(2, 372) = 325.54, p < 0.001, \eta_p^2 = 0.64$; 语言区与族际接触水平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F(2, 372) = 1.69, p > 0.05$ 。均数比较显示, 高族际接触水平民族赋分显著高于中等族际接触水平民族($p < 0.001, 95\% CI = [0.71, 1.05]$), 显著高于低族际接触水平民族($p < 0.001, 95\% CI = [2.05, 2.36]$); 中等族际接触水平民族赋分显著高于低族际接触水平民族($p < 0.001, 95\% CI = [1.14, 1.51]$)。

这表明, 裕固族中学生与高族际接触水平民族心理距离更近, 其次是中等族际接触水平民族, 与低族际接触水平民族心理距离最远。因此, 族际接触水平也是影响裕固族中学生族群认同情感态度层面的重要因素。

4.4.4 裕固族中学生与不同宗教信仰民族的心理距离

不同语言区裕固族中学生与不同宗教信仰民族的心理距离见图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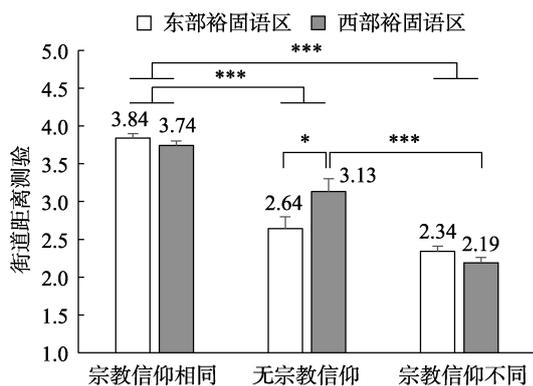


图 13 不同宗教信仰民族街道距离测验平均分

2 (语言区: 东部语言区/西部语言区) \times 3 (宗教信仰关系: 相同/不同/无)混合设计方差分析表明, 语言区的主效应显著, $F(1, 186) = 4.37, p = 0.038, \eta_p^2 = 0.02$; 宗教信仰关系的主效应显著, $F(2, 372) = 70.97, p < 0.001, \eta_p^2 = 0.28$; 语言区与宗教信仰关系的交互作用显著, $F(2, 372) = 3.73, p = 0.025, \eta_p^2 = 0.02$ 。简单效应分析表明, 对与裕固族宗教信仰相同民族(蒙古族与藏族), 东部语言区与西部语言区被试赋分差异不显著($p > 0.05, 95\% CI = [-0.07, 0.28]$); 对无宗教信仰民族(汉族), 东部语言区被试赋分显著低于西部语言区被试($p = 0.038, 95\% CI = [-0.95, -0.03]$); 对宗教信仰不同民族(维吾尔族与回族), 东部语言区与西部语言区被试赋分差异不显著($p > 0.05, 95\% CI = [-0.04, 0.33]$)。东部语言区被试对宗教信仰相同民族赋分显著高于对无宗教

信仰民族($p < 0.001, 95\% CI = [0.79, 1.61]$)和宗教信仰不同民族($p < 0.001, 95\% CI = [1.31, 1.70]$), 对无宗教信仰民族和宗教信仰不同民族赋分无显著差异($p > 0.05, 95\% CI = [-0.12, 0.73]$); 西部语言区被试对宗教信仰相同民族赋分显著高于对无宗教信仰民族($p = 0.004, 95\% CI = [0.20, 1.03]$)和宗教信仰不同民族($p < 0.001, 95\% CI = [1.35, 1.75]$), 对无宗教信仰民族赋分显著高于对宗教信仰不同民族($p < 0.001, 95\% CI = [0.51, 1.36]$)。

上述结果表明, 在情感态度层面, 裕固族中学生与宗教信仰相同民族心理距离更近, 其次是无宗教信仰民族, 与宗教信仰不同民族心理距离最远。西部语言区被试对无宗教信仰民族(汉族)赋分高于东部语言区被试, 这是由于肃南县城在西部语言区, 与汉族接触水平更高、国家通用语言更普及的缘故。

4.5 小结

街道距离测验表明, 在情感态度层面, 裕固族中学生与蒙古族和藏族心理距离最近。分析不同语言区被试对不同族源关系、不同族际接触水平、不同宗教信仰关系民族赋分, 发现无论是东部语言区还是西部语言区的被试, 都与族际接触水平高民族、宗教信仰相同民族心理距离更近。这表明, 在裕固族中学生的族群情感态度层面, 族源关系起一定作用, 但最大的影响因素还是族际接触水平和宗教信仰关系, 民族语言的作用较小。

5 讨论

本研究通过实证方法考察处在族群边缘的裕固族中学生的族群认同, 发现裕固族中学生的族群认同呈现出容器隐喻和差序格局: 与国外民族比, 被试将本民族、本地其他民族、国内其他民族置于同一容器内, 表明他们在心理层面已经实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 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 其认同又存在差序格局, 本民族处于认同的核心, 当地其他民族处在第二层, 国内其他民族处在第三层。进一步分析发现, 在裕固族中学生族群认同的认知层面和情感态度层面, 族源关系均起一定作用, 但更大的影响因素仍然是族际接触水平和宗教信仰关系, 民族语言的作用较小。下面, 就研究结果做一些讨论。

5.1 关于裕固族中学生族群认同的容器隐喻及差序格局

实验 1 显示, 处在族群边缘的裕固族中学生对国内外民族的认知加工存在容器隐喻, 国内各民族

与容器内存在内隐联结, 国外民族与容器外存在内隐联结。这表明, 在裕固族中学生的民族类别建构中, 国内各民族被重新范畴化为一个高层次共同内群体——中华民族共同体, 国外民族被建构为共同外群体。在容器内, 对国内各民族反应从快到慢依次是本民族、当地其他民族、国内其他民族, 表现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差序格局。

裕固族中学生对国内各民族名称呈现在圈内反应显著快于呈现在圈外, 说明他们将国内各民族都放置于圈内, 构建了稳定的中华民族共同内群体认同; 对国外民族反应则相反。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内各民族的认同呈现出差序格局, 实质上是对国内不同民族态度的亲疏远近之分。相较于居住在族群中心的人群, 处于族群边缘的人群对自身的族群身份尤为重视, 为了追求安全的社会地位, 在族群边界信息凸显时, 他们强调与族群中心一致的文化特征来避免认同危机(王明珂, 2006)。在实验情境下, 国内外民族名称随机出现, 因为族群边缘的认同危机, 裕固族中学生关于内外群体的信息快速激活, 中华民族成员身份也激活, 所以就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为边界, 国内各民族迅速被归为“类别内”, 国外民族迅速被归为“类别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外”代表族群边界外的“他们”,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代表族群边界内的“我们”。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 内含着国内各民族之间可跨越、有弹性的差序格局, 各民族可通过有序的边界模糊、边界扩展等形式改变民族间边界, 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大边界相对稳定(杜芳, 徐泽惠, 2023)。

周大鸣(2018)发现, 在民族走廊, 族群认同是动态发展的, 在与其他族群的互动中, 因为族际接触水平、族源关系、宗教、语言和生活方式差异出现不同程度的认同层次, 进而发展为共同体内微妙的认同层次。裕固族中学生在与当地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 不仅将他们归为与自己同类, 而且关系更紧密, 心理距离更近; 对国内其他民族, 他们更多地通过书籍、视频、媒体等渠道间接接触, 虽然将其归为与自己同类, 但比起当地其他民族, 关系紧密程度和心理距离均次之。因此, 裕固族中学生构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及差序格局符合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以及认同的层次性, 也体现了族群边缘人群在族际接触中受到来自其他族群的多方面因素影响, 在深层次认知结构中, 他们与其他族群间的边界也是清晰的。

“容器隐喻”与“差序格局”理论将族群认同具象

化、可量化, 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研究族群认同的层次结构和动态过程。引入“容器隐喻”与“差序格局”概念, 可以深化共同内群体理论, 更全面地理解共同内群体的形成和发展机制: 一是包容性与排他性, “容器隐喻”强调包摄水平更广的上位群体身份, 显示了对外群体的排他性; “差序格局”提示边界内的族群认同存在层次性, 体现出对内群体的包容性; 二是认同过程的动态性, 共同内群体内部的认同层次并非固定不变, 而是在族际接触水平、宗教信仰、族源关系、语言等因素影响下变迁; 三是族群内部的共同性, 结合“容器隐喻”与“差序格局”的共同内群体认同更关注族群内部的共同性, 以及这种共同性如何促进个体/群体间的合作与团结。

5.2 关于影响裕固族族群认同的差序格局的因素

实验2和实验3从认知和情感态度层面考察了族际接触水平、族源关系、宗教信仰和语言对裕固族中学生族群认同差序格局的影响。

(1) 关于族际接触水平的影响

在图形分类任务中, 裕固族中学生更多地使用同一图形标记裕固族和与之族际接触水平高的民族。这表明, 在认知层面, 裕固族中学生倾向于将高族际接触水平民族与本民族归为一类。在街道距离测验中, 裕固族中学生倾向将高族际接触水平民族安排在离自己家近的位置。这表明, 在情感态度层面, 裕固族中学生与高族际接触水平民族的心理距离更近。

裕固族生活在河西走廊中段, 是较早定居于肃南的少数民族, 在其周边, 大杂居、小聚居的民族达到16个, 包括藏族、汉族、蒙古族、回族四大民族, 是族群边缘的典型小族群(祁进玉, 张瀚丹, 2023)。在时间上, 裕固族与其他民族经历了长期的经济、文化、政治融合; 在空间上, 裕固族与四周多个民族都有联系, 族群关系复杂, 族际互动频繁。正因为大族群与小族群接触, 互相涵化, 才形成了有与其他民族相似的文化特征却存在差异的小族群(周大鸣, 2018)。族际接触水平影响族群认同(张积家等, 2024)。本研究将族际接触水平定义为族际接触频率和互动质量的结合。互动质量是指族际接触是否发生在平等、合作、愉悦的环境中。族际接触频率和互动质量会造成个体的族际态度不同。积极的族际接触会从认知和情感上改变个体对外族群认同, 随着对外群体信息了解, 刻板印象逐渐减少(Stathi et al., 2012), 族际互动的消极期待也减少(Plant & Devine, 2003), 内群体对外群体的强

烈排斥会减弱(Pereira et al., 2017), 个体会感知到内群体和外群体更多的共同性和相似性(Ng et al., 2016), 与外群体的心理距离会更近, 情感态度会更积极。消极的族际接触会强化负面刻板印象(Stathi et al., 2012)。

裕固族、藏族和蒙古族都属于游牧民族, 有共同的宗教信仰和相似的生活习俗, 共享许多社会文化活动, 创造了许多共同、愉悦的社会记忆, 这种接触符合积极接触条件, 是高频率、高质量的族际接触。裕固族学生在社会生活中从与藏族、蒙古族的集体社会行为中获得集体记忆, 进而强化了裕固族人对藏族和蒙古族的认同。汉族作为主体民族, 裕固族与其接触频繁, 使用其语言作为对外交际语, 但因为文化不同、共同文化活动少, 所以族际接触属于高频率、中质量的族际接触, 又由于汉族是中华民族的核心, 族群中心性在认知层面也有一定作用。裕固族与维吾尔族接触频率低, 却存在主观认同的族源关系, 族群间具有天然的根基性情感联系, 两个族群间接触也是中等水平的族际接触。因而, 裕固族中学生对汉族和维吾尔族的认同就弱于对藏族和蒙古族的认同。回族在肃南是人数较多的世居民族, 但回族所强调的族群身份特征(如宗教信仰、饮食习惯等)与裕固族差异极大。裕固族中学生与回族学生交往多限于校园内, 校外交往不多。在多种因素影响下, 裕固族在与回族接触时存在着较强焦虑, 两个族群间关系属于低频率接触和低质量互动, 这种接触焦虑又被消极的刻板印象固化, 造成裕固族中学生对回族认同水平低。因此, 单纯的族际接触不能造成族群认同变迁, 只有高水平的族际接触才促进族群认同。

(2) 关于宗教信仰的影响

宗教反映了一个民族文化内核性的世界观与宇宙观。小族群因为夹在大民族之间, 容易体现出兼容性, 其宗教信仰也如此。裕固族与蒙古族有族源关系, 自元代起, 裕固族先民就开始接触藏传佛教; 在明末, 藏传佛教格鲁派成为裕固族的主要信仰, 却仍然保留了北方游牧文化的萨满文化信仰, 在漫长历史发展中又与藏族、汉族关系密切。诸多共性造就了裕固文化更倾向于藏传佛教文化, 属于部分涵化型。宗教认同与文化认同密不可分。宗教情感与民族情感交织渗透, 宗教就悄无声息地影响民族认同(王颖, 秦裕华, 2008)。族群间拥有共同宗教信仰可以建立基于共同信仰的跨族群认同, 这种认同强化族际互动, 促进族群间社会和文化生活的

同质化(王淑婕, 顾锡军, 2012)。裕固族因为处在族群边缘, 与周边各民族族际互动频繁, 藏族与蒙古族也主要信仰藏传佛教格鲁派。在长期互动下, 裕固族选择与宗教信仰相同的蒙古族和藏族形成了一致的符号价值系统和相似的文化系统, 成为与裕固族接触、互动最密切的族群。因此, 无论是在认知层面还是在情感态度层面, 裕固族都更认同宗教信仰相同的蒙古族和藏族。

这表明, 与宗教相关的社会记忆或历史记忆被族群边缘人群所选择、强化, 并作为凝聚人群的重要工具以共同追求群体利益。总之, 宗教信仰是影响裕固族入族群认同维持与变迁的重要因素。

(3) 关于族源关系和语言的作用

族源关系是族群认同的根基性因素。族源相关民族与其说是实际的血缘关系, 不如说是被双方族群成员相信的血缘关系。实验2、3显示, 对蒙古族和维吾尔族, 东部语言区被试在图形分类任务中更倾向于将蒙古族与本族归为一类, 在街道距离测验中与蒙古族心理距离更近; 西部语言区被试在图形分类任务中对蒙古族和维吾尔族的认同相当, 但在街道距离测验中却与蒙古族心理距离更近。这表明, 东部语言区被试无论是从认知层面还是从情感态度层面都更认同蒙古族, 西部语言区被试在认知层面对蒙古族和维吾尔族的认同水平相当, 在情感态度层面更认同蒙古族。这意味着, 东部语言区被试对族源关系认知更明确, 西部语言区被试对族源关系认知较模糊。除族源相关、语言相似外, 裕固族还与蒙古族接触水平高、宗教信仰相同。西部语言区被试与维吾尔族除族源相关、语言相似外, 与维吾尔族接触水平中等、宗教信仰不同。这也从侧面映射出宗教信仰和族际接触水平的作用要大于族源关系。虽然因为族源关系和语言关系, 裕固文化与很多民族文化之间存在交叉, 但裕固族的部分涵化仍然是以藏传佛教文化为主的多向整合的产物, 共同宗教信仰对裕固族的族群认同具有重要影响。

语言与族群密切相关。但语言分类与族群分类并非一一对应(王明珂, 2006)。这种现象在民族不同支系和民族走廊上的民族等族群边缘较常见。民族语言在裕固族中学生的族群认同中作用较小。东部语言区被试受蒙古族影响更大, 其民族语言与蒙古语更相似; 西部语言区被试的民族语言中保留了较多的古回鹘语成分, 其民族语言与维吾尔语更相似。在裕固族内部, 存在三种语言——东部裕固语、西部裕固语、汉语(普通话或甘肃话), 不同语言区

的族群成员通过汉语交流。由于语言环境变化,东部裕固语、西部裕固语作为交际语言的场合和机会越来越少,裕固族的民族语言能力呈现出下降趋势。东部裕固语、西部裕固语均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极度濒危语言(Janhunen, 2010)。裕固语使用人口呈现老龄化,语言流失速度加快,本族语言能力强弱与使用人口的年龄大小呈现正相关关系(巴战龙, 2016)。仅有少部分裕固族中学生熟练使用裕固语,且多限于家庭内部,不作为外部交际语。正因为如此,在裕固族中学生中,民族语言对族群认同影响很小,汉语作为对外交际语言对族群认同影响越来越大。

民族情感形成的基础之一是共同语言与无障碍沟通。与裕固族相似,许多处在族群边缘的小族群内部其共同语言已不是民族语言而是汉语,这意味着民族语言对族群认同维持与变迁的影响越来越小。

5.3 关于裕固族中学生的族群认知与族群情感态度的结果异同

综合实验 2、3 的结果可见,在认知层面,裕固族将蒙古族、藏族和汉族与本族归为一类;在情感态度层面,裕固族与蒙古族和藏族心理距离最近。比较裕固族与三个民族的关系发现,在认知层面,族际接触水平比宗教信仰影响更大;在情感态度层面,宗教信仰比族际接触水平影响更大。族群认知的最基本过程是类别化。类别化是个体对自身或他人在社会中所处位置的感知和判断,这种感知和判断不仅基于现实社会中的分类标准,也基于自身与他人的社会比较。Allport (1954)认为,类别化是形成方便日常判断的大型种类或组块过程,它让人们快速地识别相关事物。类别是理性的,因为它们建立在被归类事物之间特征的既有差异基础上。经过类别化后,同类事物就激发人们的相同感受。Bruner (1956)认为,知觉过程是将客体归类的过程。在对人知觉时,首先把他归入某一群体。这是一个自动、无意识的过程。裕固族中学生根据与自己的关系对不同民族实现类别化,为族群情感和族群行为奠定认知基础。

在族群情感态度层面,心理距离是直接体现。对其他族群情感态度积极,心理距离就近,积极族际接触就油然而生;对其他族群情感态度消极,心理距离就远,消极族际接触就不期而至。处于族群边缘的人群为了追求安全的社会地位,对标志族群身份的社会文化特征尤为重视,民族意识强烈,在

与其他族群接触时会保持不同心理距离。虽然裕固族中学生在理智上将汉族、蒙古族、藏族置于同等地位,但在情感态度层面,宗教带来的情感依赖和动机强度超过了族际接触水平,这是裕固族的族群认同在知与情上异同的原因。裕固族中学生的族群认同的认知与情感的异同体现出族群边缘认同的本质,情感态度层面的认同最真实、贴近内心,认知层面的认同则更加理性、快速和便捷。

5.4 本研究的启示与不足

本研究从族群边缘视角出发,以裕固族中学生为被试,从实证角度揭示了裕固族中学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内部的差序格局及影响因素,发现族际接触水平和宗教信仰对族群边缘群体的族群认同具有重要影响,族源关系和族群中心性也起一定作用,这为更好地在“多元一体”格局下构建稳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提供了思路。

不同民族有不同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内多样性和包容性的体现。在我国,应努力加强宗教信仰中国化的进程,提高公众对宗教文化的认识和理解。应鼓励不同宗教信仰间的对话与交流,增进彼此的理解和信任,促进跨宗教间的融合与发展,推动宗教活动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应推进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间的友好相处,构建和谐宗教关系,增进有不同宗教信仰人们的和谐共处,团结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一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应为各族人民建立一个平等、公正的社会环境,通过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文化交流等途径,普及各民族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等知识,并强调每一民族都是多个民族融合的产物,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历史真实性,增进对不同民族的理解和尊重。通过举办民族文化节、艺术展览、体育比赛等活动,为不同民族群体提供交流平台,让彼此间有更多机会了解和欣赏对方文化,以推动不同民族间的直接接触和间接接触,进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民族团结。

本研究也存在局限性。本研究的对象是中学生。因为青少年时期是民族认同发展的关键期,而且青少年能熟练操作电脑。但未来研究仍需要采用其他范式扩展到成人,以增强结论的可推广性。族际接触水平也可能受多种因素影响而存在个体差异,进而影响族群认同。未来研究应拓宽考察范围,平衡各种控制变量,才能够更准确地揭示族群认同的本质。

6 结论

(1) 裕固族中学生在不同民族基础上建构了高层次共同内群体——“中华民族共同体”。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 存在由内及外的“本民族/当地其他民族/国内其他民族”的差序格局。

(2) 无论是在族群认知层面, 还是在族群情感态度层面, 族际接触水平和宗教信仰对裕固族中学生的族群认同影响最大, 族群中心性和族源关系起一定作用, 民族语言的影响较小。

致谢: 本研究在调研期间得到了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教育局局长安维武的大力支持和协助, 特致以衷心的感谢!

参 考 文 献

- Abu-Raiya, H., & Pargament, K. I. (2015). Religious coping among diverse religions: Commonalities and divergences. *Psychology of Religion and Spirituality*, 7(1), 24–33.
- Allport, G. W. (1954). *The nature of prejudice*. Reading MA: Addison Wesley.
- An, Y. J. (2017). *Study in the formation history of Yugur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Lanzhou University.
- [安玉军. (2017). 裕固族形成史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 兰州大学.]
- Anderson, B. (2006).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Verso Books.
- Ba, Z. L. (2016). How to build a bilingual family: A study on the inheritance of Yugur language and culture. *Journal of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37(5), 58–63.
- [巴战龙. (2016). 如何打造双语家庭——裕固族语言文化遗产传承问题研究.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37(5), 58–63.]
- Brewer, M. (2016). *Intergroup relations* (2 ed.). Beijing: China Machine Press.
- [玛丽莲·布鲁尔. (2016). *我们 你们 他们: 群际关系心理学揭秘* (第2版).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 Bruner, J.S. (1956). *A study of think*. New York: Wiley.
- Carla, J., & Reginald, J. (1998). Racial identity, African self-consciousness, and career decision making in African American college women. *Journal of Multicultural Counseling & Development*, 26(1), 28–38.
- 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 2021*. Retrieved November 30, 2024, from <https://www.stats.gov.cn/sj/ndsj/2021/indexch.htm>
- [中国统计年鉴 2021. 2024-11-30 取自 <https://www.stats.gov.cn/sj/ndsj/2021/indexch.htm>]
- Dovidio, J. F., Eller, A., & Hewstone, M. (2011). Improving intergroup relations through direct, extended and other forms of indirect contact. *Group Processes & Intergroup Relations*, 14(2), 147–160.
- Du, F., & Xu, Z. H. (2023). Interaction of ethnic boundaries: A stabilization mechanism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Journal of Ethnology*, 14(5), 26–33+120.
- [杜芳, 徐泽惠. (2023). 族群边界互动: 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稳定机制. *民族学刊*, 14(5), 26–33+120.]
- Duan, D. Z. (2005). *Religion and society: A study of the sociology of religion as religion*. Beijing: China Culture and History Press.
- [段德智. (2005). *宗教与社会: 对作为宗教学的宗教社会学的一个研究*.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 Fei, X. T. (1982). On deepening ethnic investigation issues. *Journal of South-Central Minzu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3), 2–6.
- [费孝通. (1982). 谈深入开展民族调查问题. *中南民族学院学报*, (3), 2–6.]
- Fei, X. T. (2004). *Anthropology and cultural self-awareness*. Beijing: Hua Xia Publishing House.
- [费孝通. (2004). *乡土中国*. 北京: 北京出版社.]
- Feng, X. H., Zhang, H., & Zhang, J. J. (2023). The influence of intergroup contact and linguistic label on the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 *Community Psychology Research*, 16(2), 269–288.
- [冯晓慧, 张航, 张积家. (2023). 群际接触与语言标签影响中华民族认同的层次性. *社区心理学研究*, 16(2), 269–288.]
- Gluszek, A., & Dovidio, J. F. (2010). Speaking with a nonnative accent: Perceptions of bias, communication difficulties, and belong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Social Psychology*, 29(2), 224–234.
- Huntington, S. P. (2010).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Beijing: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 [萨缪尔·亨廷顿. (2010).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北京: 新华出版社.]
- Janhunen, J. (2010). *Northeast Asia*. In Moseley, C. (Ed.), *Atlas of the world's languages in danger* (3rd ed.). Paris: UNESCO Publishing.
- Jian, Z. X. (2004). Religious belief and the ethnic boundaries. *Northwestern Journal of Ethnology*, 41(2), 175–187.
- [菅志翔. (2004). 宗教信仰与族群边界——以保安族为例. *西北民族研究*, 41(2), 175–187.]
- Jiang, J. Y. (2012). Historical memory and ethnic identity. *Journal of Guangzhou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11(4), 26–30.
- [江杰英. (2012). 论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1(4), 26–30.]
- Lai, J. (2017). *The research on opinion guidance in the ethnic religious of Yunan province*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Yunan University, Kunming, China.
- [赖俊. (2017). *云南省民族宗教舆论引导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云南大学, 昆明]
- Lemay Jr., E. P., & Ryan, J. E. (2021). Common ingroup identity, perceived similarity, and communal interracial relationship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47(6), 985–1003.
- Li, X. X. (2013). A further study on ethnic corridor: Also about the Wushan–Wuling corridor. *Journal of Guangxi Minzu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35(2), 16–25.
- [李星星. (2013). 再论民族走廊: 兼谈“巫山–武陵走廊”.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35(2), 16–25.]
- Liang, F. M., Zhao, Y. F., & Yin, C. Z. (2023). Common ingroup identity promotes ethnic psychological compatibility: The mediating role of positive interpretation bias. *Journal of Psychological Science*, 46(2), 386–393.
- [梁芳美, 赵玉芳, 尹晨祖. (2023). 共同内群体认同促进民族心理融合: 积极解释偏向的中介作用. *心理科学*,

- 46(2), 386–393.]
- Lyu, J. B. (2023). Viewing the evolution of Jing people's identity from using Jing dialect, Cantonese, to mandarin. *Guangxi Ethnic Studies*, (4), 100–107.
- [吕俊彪. (2023). 从“京族话”“白话”到普通话的语言使用看京族的认同演变. *广西民族研究*, (4), 100–107.]
- Ma, G. Q. (2006). South China as a method: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transformation between center and circumference. *Thinking*, (4), 1–9.
- [麻国庆. (2006). 作为方法的华南: 中心和周边的时空转换. *思想战线*, (4), 1–9.]
- Meng, L., Ye, C., Wang, J. J., & Zhang, J. J. (2022). Container metaphor, intergroup attitude, and helping tendency toward domestic and foreign ethnic groups of Tibetan students in hinterland senior high school.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54(11), 1366–1380.
- [孟乐, 叶灿, 王佳佳, 张积家. (2022). 内藏班高中生对国内外民族的容器隐喻、群际态度和助人倾向. *心理学报*, 54(11), 1366–1380.]
- Meng, H. L., & Guo, W. S. (2023). The development and use of language attitude sca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nosociology. *Qinghai Journal of Ethnology*, 34(3), 81–90.
- [孟红莉, 郭炜淞. (2023). 民族社会学视角下的语言态度量表编制与运用. *青海民族研究*, 34(3), 81–90.]
- Ng, Y. L., Kulik, C. T., & Bordia, P. (2016). The moderating role of intergroup contact in race composition, perceived similarity, and applicant attraction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Psychology*, 31(3), 415–431.
- Pereira, A., Green, E. G. T., & Visintin, E. P. (2017). National identification counteracts the sedative effect of positive intergroup contact on ethnic activism.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8, 477.
- Plant, E. A., & Devine, P. G. (2003). The antecedents and implications of interracial anxiety.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9(6), 790–801.
- Qi, J. Y., & Zhang, H. D. (2023). Population mobility and interactions, exchanges and integration among all ethnic groups in the Hexi Corridor: A case study of Sunan Yugur autonomous county of Gansu province. *Journal of Northwestern Ethnic Studies*, (3), 121–133.
- [祁进玉, 张瀚丹. (2023). 人口流动与河西走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为例. *西北民族研究*, (3), 121–133.]
- Schröder, U. (2015). Society and culture as container: (Re-)drawing borders and their metaphorical foundation from a communicative and extracommunicative point of view.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Culture*, 2(1), 38–61.
- Singh, R., Wegener, D. T., Sankaran, K., Bhullar, N., Ang, K. Q., Chia, P. J., ... Chen, F. (2017). Attitude similarity and attraction: Validation, positive affect, and trust as sequential mediators. *Personal Relationships*, 24(1), 203–222.
- Stathi, S., Tsantila, K., & Crisp, R. J. (2012). Imagining intergroup contact can combat mental health stigma by reducing anxiety, avoidance and negative stereotyping. *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52(6), 746–757.
- Sunan Yearbook 2021*. Retrieved November 30, 2024, from http://www.gssn.gov.cn/ztl/dqzl/202205/t20220516_845567.html
- [*肃南年鉴 2021*. 2024–11–30 取自 http://www.gssn.gov.cn/ztl/dqzl/202205/t20220516_845567.html]
- Tajfel, H., & Turner, J. C. (1986). The social identity theory of inter-group behavior. In S. Worchel & L. W. Austin (Eds.),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Chicago: Nelson-Hall.
- Wan, M. G., Gao, C. H., Dang, B. B., & Sa, L. (2015).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Hui children's in-group favoritism attitude. *Journal of Psychological Science*, 38(6), 1411–1418.
- [万明钢, 高承海, 党宝宝, 撒丽. (2015). 回族儿童族群偏爱态度的形成与发展. *心理科学*, 38(6), 1411–1418.]
- Wang, M. K. (2006). *On Chinese borderlands: Historical memory and ethnic identity*. Beijing: Social Science Academic Press.
- [王明珂. (2006). *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Wang, R. P., & Ma, J. (201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igious belief and mating mentality of young people in minority nationalities: A case study of Sala nationality and Bao'an nationality. *China Youth Study*, (12), 17–21.
- [王瑞萍, 马进. (2012). 论宗教信仰与人口较少民族青年择偶心态的关系——以撒拉族、保安族为例. *中国青年研究*, (12), 17–21.]
- Wang, S. J., & Gu, X. J. (2012). The religious identity and cultural symbiosis model in Amdo area. *Tibetan Studies*, (3), 97–104.
- [王淑婕, 顾锡军. (2012). 安多地区宗教信仰认同与多元文化共生模式溯析. *西藏研究*, (3), 97–104.]
- Wang, Y., & Qin, Y. H. (2008). On Xinjiang national cultural recognition and religious recognition. *Journal of Xinjia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Social Science)*, 36(6), 76–79.
- [王颖, 秦裕华. (2008). 关于新疆民族文化认同与宗教认同. *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 36(6), 76–79.]
- Xia, M. H. (2019). *Research on Sino-Indonesia people-to-people exchan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group Contact Theory*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 [夏明慧. (2019). *群际接触理论视角下的中国与印度尼西亚人文交流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华中师范大学, 武汉.]
- Xu, Z. J. (2023). Firmly cast the theoretical logic of the sinicization of religion in the vision of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Studies in World Religions*, (6), 1–9.
- [徐志坚. (2023).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中宗教中国化的理论逻辑. *世界宗教研究*, (6), 1–9.]
- Yan, Q., & Tan, Y. (2024). Functional analysis of the national language in forg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community for Chinese nation: Taking the theme of the Putonghua week as an example. *Journal of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61(2), 23–30.
- [严庆, 谭野. (2024). 国家通用语言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功能分析——以普通话宣传周主题为例.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61(2), 23–30.]
- Yang, F. X., & Zhang, H. J. (2015). Bin Royal in Mongolian to the formation of Yugur. *Inner Mongolia Social Science*, 36(3), 37–43.
- [杨富学, 张海娟. (2015). 蒙古幽王家族与裕固族的形成. *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 36(3), 37–43.]
- Zhang, J. J. (2018). Container metaphor, differential mode of association and national psychology. *Journal of Southwest Nationalities College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39(5), 214–221.
- [张积家. (2018). 容器隐喻、差序格局与民族心理.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39(5), 214–221.]
- Zhang, J. J., & Feng, X. H. (2022). Psychological construc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identity of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Journal of Research on Education for Ethnic Minorities*, 32(2), 5–14.

- [张积家, 冯晓慧. (2021). 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心理建构与影响因素. *民族教育研究*, 32(2), 5-14.]
- Zhang, J. J., & Feng, X. H. (2022). Ethnic marginal: The best perspective in the study of the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Tribune of Education Culture*, 14(4), 55-70.
- [张积家, 冯晓慧. (2022). 族群边缘: 中华民族共同体心理发展研究的最佳视角. *教育文化论坛*, 14(4), 55-70.]
- Zhang, J. J., Wang, T., & Wu, L. M. (2024). Ethnic minority high school students' cultural attachment to the local ethnic groups and Chinese nation. *Journal of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1), 75-92+206.
- [张积家, 王婷, 伍丽梅. (2024). 民族互嵌地区少数民族高中生对区内民族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依恋.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 75-92+206.]
- Zhang, J. J., & Zhang, S. Y. (2024).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nd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for Chinese nation. *Journal of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60(4), 1-23.
- [张积家, 张姝玥. (2024). 论民族意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关系.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60(4), 1-23.]
- Zhang, Y. N. (2023). Strengthe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guidance enhance Chinese cultural identity further promote the sinicization of religions. *Journal of the Central Institute of Socialism*, (4), 120-129.
- [张祎娜. (2023). 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增进中华文化认同 深入推进宗教中国化.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4), 120-129.]
- Zhang, Z. G. (2008). Religions and international hot issues: The deep impact of religions on international hot issues and grave conflict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4), 42-54.
- [张志刚. (2008). 宗教与国际热点问题——宗教因素对冷战后国际热点问题和重大冲突的深层影响.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4), 42-54.]
- Zhou, D. M. (2018). Ethnic corridor and ethnic interaction. *Journ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58(6), 153-160.
- [周大鸣. (2018). 民族走廊与族群互动.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58(6), 153-160.]
- Zhu, X. Y. (2023). "Family World": Linguistic forms of religious life along the Dianchi lake. *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43(6), 1-25.
- [朱晓阳. (2023). "家人世界": 滇池沿岸宗教生活的语言形式. *社会*, 43(6), 1-25.]

The container metaphor and differential mode of association of ethnic identity among Yugu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DENG Bilin¹, WANG Ting¹, ZHANG Jijia¹, LIU Xiancui², LIU Sha²

¹ Faculty of Education/Academy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541004, China)

² School of Psychology,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China)

Abstract

The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represents a high-level shared group constructed by various ethnicities on the foundation of ethnic identity, which itself exhibits a hierarchical structure. The ethnic identity of marginal ethnic groups arises through complex processes of change, leading to varying levels of consciousness regarding the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Yugur people, associated with Mongolian and Uyghur origins but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by Tibetan and Han cultures, offer a unique perspective due to their marginal characteristics and spatially intertwined multi-ethnic living patterns. These characteristics make the Yugur population a valuable subject for investigating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container metaphor, the differential mode of association, and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ethnic identity of Yugu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from marginal ethnic groups. The findings aim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strategies to strengthen aware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s community.

Three experiments were conducted to investigate the ethnic identity of Yugu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Experiment 1, the spatial Stroop paradigm was applied to examine the container metaphor and the differential mode of association in their ethnic identity, involving 117 participants ($M_{\text{age}} = 15.32 \pm 1.64$ years). Upon confirming the existence of these phenomena, Mongolian, Tibetan, Han, Uyghur, and Hui ethnic groups were selected as experimental materials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s of inter-ethnic contact, ethnic origin relationships, language, and religion on the differential mode of association for ethnic identity. Experiment 2 ($N = 146$, $M_{\text{age}} = 15.04 \pm 1.76$ years) employed a graphic classification task to investigate ethnic cognition, while Experiment 3 ($N = 188$, $M_{\text{age}} = 14.79 \pm 1.78$ years) utilized a street distance test to examine ethnic emotion.

The results of Experiment 1 demonstrated that Yugu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responded significantly faster

to the names of their own ethnic group, other local ethnic groups, and other ethnic groups in China when presented inside a circle compared to outside it. Conversely, responses to the names of foreign ethnic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slower when presented inside the circle than outside. The reaction times from fastest to slowest were observed for their own ethnic group, other local ethnic groups, other ethnic groups in China, and foreign ethnic groups. These findings indicated that Yugu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have constructed a high-level common ingroup, the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and an internal differential mode of association in ethnic identity encompassing their own ethnic group, other local ethnic groups, and other ethnic groups in China. Experiment 2 revealed that students tended to use the same graphical representation for Yugur, Tibetan, Han, and Mongolian ethnic groups, suggesting that inter-ethnic contact and religious belief were primary influencing factors at the cognitive level of ethnic identity. Ethnic origin played a moderate role, while minority language exerted minimal influence. Experiment 3 indicated that students were more likely to assign houses closer to their own home to Mongolian and Tibetan groups, highlighting that religious belief and inter-ethnic contact were key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levels of ethnic identity, with ethnic origin playing a secondary role and minority language having a minor impact.

In summary, Yugu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have formed a high-level common ingroup, the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and an internal differential mode of association in their ethnic identity. Religious belief and inter-ethnic contact emerged as the most significant factors shaping this differential mode of association, particularly among marginalized ethnic groups.

Keywords Yugur, ethnic identity, container metaphor, the differential mode of association,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